

书名 中国经济反思录（上）

【版权页情况】

出版社：南方出版社

书号：ISBN 7—2733—4027—C

版本：2005年3月第1版

署名：蔡恩新/编著

电子版定价：5.00元

目 录

第1辑 不管白猫黑猫，捉老鼠就是好猫

- 一、回到文革去
- 二、泥腿子的“叛逆”
- 三、贫穷能维系稳定吗
- 四、姓“富”还是姓“穷”
- 五、“左”魂灵的问与答
- 六、民心是一杆称
- 七、资本主义复辟
- 八、鬼子来了
- 九、“左”比右好
- 十、五千年，一句话

第2辑 中国商人起步史

- 一、中国商人的历程
- 二、中国老板群体的发展状况
- 三、对中国老板的认识与批判
- 四、希望的田野上
- 五、农民商人进城
- 六、农转非：麻醉人的光环
- 七、“干部”掉价了
- 八、辞官，没听说过
- 九、辞官！入海成龙
- 十、公家靠不住了
- 十一、为自己赚钱：人才大“跳槽”
- 十二、拎着保险绳“下海”
- 十三、文化转型者
- 十四、悲凉之雾：知识分子有多穷
- 十五、天上掉下个知识馅饼
- 十六、倒书成商
- 十七、闯入商界的文化人

- 十八、何苦死撑面子
- 十九、到处都是外地人
- 二十、神州摊贩知多少
- 二十一、老外，中国贩子也不是吃素的

第3辑 特权时代

- 一、权力资本——超经济暴利资本
- 二、价格双轨：“官倒”携款潜逃
- 三、权力的第二次机遇：利率差价
- 四、第三次机遇：巨商争雄房地产
- 五、第四次机遇：权力股票
- 六、第五次机遇：最后的疯狂——蛇吞象
- 七、成就说明了什么
- 八、苍蝇“越打越肥”
- 九、站在“高岗上”
- 十、权力是怎样疯狂的
- 十一、腐败谁之过

第4辑 地下经济在中国

- 一、腹蛇的启示
- 二、地下经济能“肿”多大
- 三、“搞活”地下经济
- 四、“寄生”在光天化日下
- 五、诚实与欺骗“和睦”共处
- 六、“天使”与撒旦结的怪胎：高利贷
- 七、防不胜防的走私狂潮
- 八、新的“鸦片战争”
- 九、令人眼花的毒品暴利
- 十、可以炫惧的罪恶：造假
- 十一、“野鸡”挡道
- 十二、地下经济的“功”罪
- 十三、宠物也疯狂
- 十四、文化掮客，斯文败类

正文

第1辑 不管白猫黑猫，捉老鼠就是好猫

据说在十八世纪的埃及，当拿破仑目睹中国劳工的坚韧之时，发出了一句惊世的预言：那东方的国度是一头睡狮。

可清王朝的中国——穷，这是封建的祸端。

十九世纪，一位游历了大江南北的洋传教士著书说：“这是一片无比肥沃富饶的土地”，可中国人那时却更贫更穷——这是专制、掠夺的祸端。

当中国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国人以“一辈子吃两辈子苦”的坚韧，要摘下一穷二白的帽子，中国人不怕穷！

在“大跃进”的年代，我们设定了“超英赶美”的速成计划，甚至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后，每个人可以免费领取多少布都已算好了……可随之而来的是千千万万的“浮肿病”，那时中国人饿死了多少？

在十年“文革”，乞灵于“抓革命，促生产”，豪迈地高呼“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当我们在高唱“社会主义好”的赞歌时，却不得不忍受票证的难堪……这些都是“左”的祸端。

“左”祸，误国害民。

我们曾经很天真，我们生活在天堂；我们甚至一度很“狂妄”：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救他们。而且我们也很固执：如果资本主义复辟，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而我们最终得到了什么？

愚昧和贫困。

直到古老的国度打开“开放”之门时，我们恍然大悟了，哦，原来我们正穷着呢。

“中国要发达起来，中国穷了几千年，现在是改革这种状况的时候了。”邓小平说人民渴望富裕，富裕的原则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所以人民奋不顾身地投身于改革的潮流。

中国人的碗里自由了，屋里有了彩电、音响，身上的衣服有了色彩，课堂上有了ABC，文化市场有了摇滚乐，商业领域有了“商战”，荒芜的土地上耸立起了特区，交易所里有了股票……

站在二十世纪的终点，我们并不炫耀中国十八年改革的“辉煌”，因为中国还远不够“发达”；也并不自诩中国人“富了”，因为我们还在向“小康”迈步。但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中，至深至切地体会到改革所带来的奇迹。

十八年改革，十八年风雨，“‘左’的根子很深”，“根深蒂固的是‘左’的东西”，“‘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邓小平》。改革开放每走一步，总会有‘左’魂灵横刀拦马，开口闭口“姓资姓社？”每一次“左”的思潮都是一根棍子，把经济向衰败驱赶；都是一副镣铐，紧紧地锁住人们的手脚。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如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两个凡是”的否定一样，生产力标准也否定了新的“凡是派”（凡事都要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让老百姓放心大胆致富赚钱。

泱泱大国，13 亿人口，底子这么薄，实在乱不得，乱了，那是真的“天下大乱”。如何才能维系稳定？靠搞政治运动压制吗？那只能把国家搞得更穷更乱，无疑于在社会的延时炸弹里填充更多的“TNT”。

贫穷不能维系稳定。

“民富国强”，人民受惠于改革，人民自然选择改革，拥护改革，支持改革者。

一、回到文革去

几年前，在《新民晚报》上，舒展先生建议，让那些“最最最革命的理论家带着他们的哥儿们开辟一个‘回到文革去’的特区。”

在那里，他们尽可以成天发改革开放的牢骚，尽可以过足“大批判”的瘾头。那里的农田，不妨改成“不长资本主义苗”的试验田，看看大家重新用起布票、棉花票、日用品卡是否其乐融融。那里的人民公社、革委会、文工团一律保护“大锅饭”，男女老幼、勤懒智愚统统进入绝对平均和无差别境，从此消灭了“红眼病”。那里的电影是“八个样板戏”，小说是“高大全”，歌曲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标语口号响彻云霄，方海珍们风韵犹存，但人们的思想纯而又纯，阶级斗争仍须年年讲，日日讲，天天讲……

这是一出以实践来检验真理的国土，让人们把目光回头冷视：不怕不认货，就怕货比货，这句大实话却是再有理不过了。

北京郊区，一位农民小企业主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如果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们还是按着老路子走，也就是说“按既定方针办”，按“两个凡是办”，“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八亿农民一律听从支部书记的钟声和哨声来指挥，拨一拨转一转，不拨不转，那社员们辛辛苦苦干一天，工分不到一角钱，干上一年最后有的还要欠工分帐。那时的宣传却称赞是“农村工厂化”，“农民工人化”。“大锅饭”几天之后，把粮食全吃光了。可知道有多少农民饿死吗？

小岗村位于凤阳县正东方向，离县城整整 80 华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小岗饿死 60 人，死绝 6 户，76 人背井离乡去讨饭。1960 年，全村只有 10 户人家，39 个不能乞讨的老弱病残者蜷缩在一间间泥巴草房里。村边的那口死水塘，水干了，村里死的人多，没人有力气挖坑，就都浮埋在那里……

北京《××报》主编王奇被押送到农村“监督劳动”，后来他回忆道：“我所在的那个生产队是个穷队，山区土地瘠薄，那几年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生产大幅度下降，每个劳动日（10 分）值才有 1 角 8 分 2 厘 3，我每天辛勤劳动只挣 8 分工。我的全部财产，除了父母给我的身体之外，真是一无所有，我拿什么养活家人呢？当时把偷钱包的叫做“钳（钱）工”，把

偷自行车的叫“车工”，把职业卖血者叫做“酱油工”。“家贫不惜宝”，我也只有走上卖血一条路了。100CC 二人民币 15 元——这就是血的价格。

1976 年成都街口，有一首署名“黄蜂”的《票证歌》，它是行将完全觉醒的人民群众在长久沉默之后的一声呐喊。“黄蜂”自不是真名，作者叫李唯苏——

“记得(成都)文化宫门口有一张大字报，鼓吹‘文革’是‘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许多人在上面批了不少小字，多以生活每况愈下为例，斥其荒谬绝伦。造反派又写出大字报，说文革的阵痛是必然结果，将来中国会如何光明，最可笑的是，竟称当时泛滥的票证是共产主义分配方式的萌芽。当时我二十多岁，究竟涉世未深，血气方刚，也不管那坐监杀头的危险，回家后写下了《票证歌》：

烟要票，酒要票 / 肉要票，糖要票 / 样样东西
都要票 / 每人发了一百号 / 一号买豆豉 / 二号买粉
条 / 三号买点心 / 四号买花椒 / 五六七八九十号 / 妈
妈记，娃娃抄 / 密密麻麻列成表 / 每月墙头贴一张
/ 家家户户不可少 / 平时票证要锁好 / 每票买啥要
记牢 / 逢年过节票更多 / 美其名曰“皇恩照” / 豆
腐乳，一张票 / 火柴肥皂各一票 / 烟票锅票灯泡票
/ 花生糯米月饼票 / 缝纫机凭工资卷 / 自行车儿票
拮据票 / 婴儿才有白糖票 / 产妇才配红糖票 / 粮票要
分粗和细 / 号票也分市和郊 / 这这样票，那样票 / 只
有一票给忘掉 / 年满十八该选举仁十还没见选票
/ 美帝反动苏联修 / 只有我们最最好 / 继续革命开
新篇 / 艰苦奋斗要记牢 / 文化革命凯歌奏 / 只管拉
车不吃草。

为避免惹祸，将一张白纸四边剪裁一些，使之看不出原来的开数；笔迹一改自己的习惯，用圆珠笔一笔不苟地写，为了不留‘作案’指纹，还戴了手套。写好之后，像当年亚瑟画牛虻一样，在右下角画了一只黄蜂。

待夜深人静之时，我与 C 君穿上黑大衣，戴上棉帽、口罩和手套，怀揣《票证歌》，颇有几分‘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气。贴在文化宫为宜，因为这里已成为论战的中心，再说那晚这里停电，真乃天助我也。于是我们将自行车停在有两条街之距的体育场围墙边，没有锁，以便及时逃遁，佯作自外地甫归状，迳往文化宫走去。

见四下无人，由 C 君望风，我迅疾摸出浆糊，倾涂于那张鼓吹‘文革’是历史新纪元的大字报上，随即从怀中掏出《票证歌》胡乱贴上面，然后与 C 君一溜烟遁去。当我们跑到停自行车处时，浑身已是大汗淋漓了。

第二天，文化宫门口人山人海，不知有多少人在抄写。大家在哄笑，在叫绝。我不动声色地看着自己的‘小把戏’竟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心情该是何等畅快。我故作镇定地走到文

化宫一看，墙上贴大字报处，已被挖个方框，《票证歌》被公安局起走了，还拍了照。然而它的影响，即是当局无法扼止的了，它迅速地传播——北京、上海、重庆……到处都有人转抄，而且很多地下刊物，如重庆《新潮》、北京的《四五论坛》，都转载和论及此事。并非《票证歌》怎么样了不得，它只是代表了人民的心声。”“叛逆”的声音，预言着改革的火种在民众心中萌动。

二、泥腿子的“叛逆”

这里是历史的转变处，湘乡县沙田乡大坪村，毛泽东的外婆家。1961年春天，在这里发生了一件震撼整个中国的事情：第一个解散了公共食堂。来了中央调查组，开了一晚上的会。面对饥饿走投无路的农民，壮着胆子说了心里话，后来经中央领导批准，农民终于可以在自家的锅里吃饭了。那是最后的早餐，迎着东方的红日，农民舔净了碗里的饭粒，拿着各自的餐具，回到自家的锅灶旁……

这里是历史的起点，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978年11月，18户饥肠辘辘的农民，联名签字画押，决定包干到户。他们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这份“保证书”写在一张简陋的白纸上，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

如今，它静静地躺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一动不动，仿佛已经沉睡。透过光洁的玻璃，可以看到18位泥腿子的“保证书”，敲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先声。

1977年6月，万里赴安徽上任前夕，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抓住万里的手，激动地说：“安徽就指望你了，硬是要把它搞出成绩来！”

万里苦苦地思索多日，他决计不顾个人荣辱沉浮，要为安徽4500万父老乡亲做一项重大决议。

1978年9月1日，安徽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万里说出了他思考多日的想法：“要全力抗旱，能多收一斤就多收一斤，能多收一两就多收一两。保不住收成，一切都是空话！农民很穷，他们手中无钱，就是国家供应返销粮也买不起，这怎么行呢？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撂荒，倒不如借部分土地给农民……”

此言一出，与会同志大为震惊！

就在这时，一股强大的冷风从北京刮来了。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封名为张浩的读者来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该

文编者按指出：“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1979年3月16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的第二天，安徽省第一书记万里驱车来到滁县地区。

当时滁县地区是大包干到组、联产责任制的发源地，搞得很活跃。万里一下车，就被各级干部和群众围住了。人们群情激愤，纷纷要求省委拿主意。

万里耐心地解释和劝慰说：“同志们不要急，省委支持你们！”

有个县委书记听了，摩拳擦掌地说：“万书记，我们听您的，不动摇了！”

万里点点头，大声说：“对，不能动摇了！一动就乱，生产就要出问题……”

经过一番风雨，安徽全省的农业形势大好，“要吃米，找万里”，万里在肥西县山南区搞的试点产量翻番。更惊人的是小岗。

1979年，小岗粮食总产量14万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5年的粮食产量总和，油料作物也喜获丰收，全年共收3万5千斤，相当于小岗从1960年到1978年将近20年的总和。

小岗人彻底告别了靠救济的日子，他们履行了他们的诺言，这一年向国家售粮2万5千斤，山芋干5千斤，油料作物2万5千斤，还第一次偿还了国家贷款……

1980年1月20日，上午8点40分，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出现在小岗的土地上。

万里握着一双双粗糙的手、劳动的手、曾经讨过饭的手，大声说：“同志们好啊！……”

小岗之行，给万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万里专门打电话给邓小平汇报。邓小平那时已实际上主持了中央工作。当小岗村这个名字第一次在巨人邓小平耳边响起时，无比敏锐的他马上有了兴致，说：“农民自发搞起来了，这是大势所趋呀……”

到1981年6月，全国农村农民家庭承包的生产队已占总数的87%，沉睡的中国农村苏醒了。

为推动农村改革的顺利进行，1982年元旦，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把农村工作放在首位的中央1号文件出台了，它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毫不含糊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为几年来无休无止的大争论划上了句号。

这也许是一个悖论：当年“打土豪，分田地”时，农民一

呼百应喜气洋洋，可一旦把他们绑在“人民公社”的绳索下，要他们狠斗“私”字一闪念，却蔫了，宁肯大家穷也愿意出工不出力，落个挨饿讨饭的苦果。但“包干到户”，让农民为“自己”种粮，却朝气蓬勃。这让某些“左”先生很是丧气：三十年的“斗私批修”，却抵不过一个“单干”。何必挖苦人是“自私的动物”，在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城市允许个体、私营企业“赚钱”，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以达到“民富国强”。

三、贫穷能维系稳定吗

受“左”的伤害最深、最早尝到改革甜头的农民，最有发言权：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能有今天的安定团结吗？农民为了不饿死找饭吃起来闹事，是什么力量也抵挡不了的！

一位××市的副市长，1992年曾到广东和深圳特区参观，回京后他对我说了一段值得深思的话。他说广东的宝安县与香港数海里相隔，在1978年之前，为了阻截农民向外逃跑，把全县的军队公安都摆在接壤的边境上，但是农民还是冒死外逃，军警铁丝网还有大海，都挡不住农民向资本主义世界的香港外逃。

仅仅在十年后的今天，好像奇迹自天而降，外逃的农民不仅返回了家乡，各村的“逃港户”的耻辱门牌也都不见了，而且有些“老香港”看到我们这边现代化城市（指深圳、珠海）拔地而起，特别看到农民们的新居楼房，连绵错落在渔塘田禾间，他们羡慕极了，有的还申请重返老家落户。

有一位驻深圳的记者说了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在1989年六·四风波期间，南方的特区平静无事，反而冷眼看北京。据说，有一位农民对学生说，你们上街闹事，这是你们的事，可别想要我们跟你们去。你们游行时要喊邓小平万岁的口号，每喊一句，我给一百元钱，我用计算机给你计算，最后全部付清，概不欠账。因为我们这里的农民都沾了邓小平的光，都富起来了，我现在很有钱了，还盖了新楼房……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趣意之中又蕴含着一个严肃的真理：只有富裕才能使人思安定。

“民富国安”，祖宗创造的这个成语，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社会辩证法。生也者，人类之大道也（中国古代哲言），老百姓穷得没法活，就逼得要造反：社会财富贫乏，一部分人多占有就会威胁着另一部分人的生存，阶级斗争就会异常尖锐，天下就不得太平。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多发生在哀鸿遍野的饥荒年间，最穷的地区往往就是革命的根据地——井冈山、川陕地带……

再环顾周围，大体如此。

越是贫穷的国家、地区，越是容易出现动乱、政变，领导

人换得像走马灯似的。而在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对社会风波承受力增了，对待街头示威司空见惯，应付自如，并不大惊小怪。

稳定压倒一切。这句话本没有错。泱泱大国，13 亿人口，底子又这么薄，实在乱不得。乱了，那就是真正的“天下大乱”。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维系社会稳定。

靠搞政治运动压制吗？“文革”的浩劫证明，那只能把国家搞得更穷更乱，无异于在社会的延时炸弹里填充更多的“TNT”。

贫穷不可能维系稳定。

那么，摆脱贫困靠什么？

在正常的情况下，当然是靠努力薄赋敛，休生息。但当生产力束缚和摧残的时候，这就要靠社会变革。

变革，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变革史。变革是历史的必然，但变革也可能会带来暂时的社会震荡。在一定的历史情况下，我们只有承受住这种社会震荡，如果因怕震荡而抱残守缺，把矛盾推向身后，那么，等待着的必然是更大的震荡和激变。

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哗啦啦倒下一大片。论其原因，你可以说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也可以归结为他们政治手腕太软了，还可以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但这一系列因素之所以能起作用，最根本的一点是经济改革搞晚了，经济垮了。苏联社会主义搞了 70 年，搞得柜台里没有商品，物价飞涨，再美好的主义，老百姓也不会巴心巴肝地拥护，解体就解体，不少人接受了。难怪有人说，苏联是“安乐死”。

四、姓“富”还是姓“穷”

姓之用大矣。指斥一个人晕头转向，说他“不知道姓什么了”，就如形容一个人糊涂颠预为“做官把印丢了”一样。阿 Q 自称跟赵太爷是本家，招来一记耳光，“你怎么配姓赵——你哪里配姓赵？”

1991 年，中国的一些著名报纸和刊物，相当集中地连续发表文章，讨论“问一问姓资姓社”的问题：

——“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的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掩护下，有人确定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

——“改革不问‘姓社姓资’，其前途是危险的”。

“问问姓‘社’还是姓‘资’，”作为一种修辞方式，似是几十年“天下穷人是一家”这一宣传的继承和发展，大家都“姓共”、“姓农”、“姓穷”，这曾经是发动贫苦农民同仇敌忾的

有力口号。

人们不会忘记，在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岁月里，也问过姓资姓社。那时的经典答案便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先给“草”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封号，然而论证：“草”姓“社”，虽然是“草”，我们还是要的；因为苗姓“资”，尽管是“苗”，我们也不要——豪迈的语言，顽强的愚蠢。

然而现在已不是依靠雇农打土豪分田地或进行土改的时期，也不是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合营改造时期了，尤其不是“左”祸猖獗的文革浩劫时期了。中国人民从切身的痛苦经验中，找到了改革开放这条摆脱贫穷落后的道路，那种所谓“苗”、“草”的违情悖理之论，已被“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代替了。

如果一定要问姓的话，还是多问问中国到底要姓“富”还是要姓“穷呢”。

五、“左”魂灵的问与答

国际饭店楼顶闪亮外商的广告，“姓资姓社”？

让外国商人在我们的国土上，居高临下，耀武扬威，同旧上海有何区别？“姓资”。

虹桥开发区向外商批租土地，“姓资姓社”？

不要忘记旧上海的“租界”！现在还搞“租让”？“姓资”！典型的卖国主义和投降主义。

那么，搞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造就“社会主义香港”、“开发浦东”，姓什么呢？

有的文章说，改革开放问“姓社姓资”，是“不问不知道，问过见分晓。”事实上，改革开放一开始，就不断地在“问”，也不断的在“答”。

十几年的历史，不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只不过“左”魂灵们，屡“问”屡“答”，屡答屡错。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农村最大的改革便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叫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姓社姓资？问过吗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虽然不敢问，答案却十分响亮，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姓资！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生气勃勃。答案是：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是对社会主义的威胁。

“姓资！”

搞厂长负责制，“姓资姓社”？答案是：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姓资”！

发展一些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这是私有制潜行，会改变在社会主义性质。“姓资”！

引进外资，“姓资姓社”？答案是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

展资本主义。“姓资”！

划出一块土地给外商承包开发，“姓资姓社”？答案是：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这就不仅是“姓资”的问题，简直就是“卖国贼”，“姓贼”啦！

市场经济，“姓资姓社”？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姓资”！

这类事例，还可以举出许多。总之，正如有人概括的：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承包责任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时东西，都难逃脱被说成“姓资”的厄运。

每一个问“答”都是一根棍子，把经济向衰败驱赶；都是一副镣铐，紧紧地锁住人们的手脚。

倒退是历史的翻版，历史的重复。倒退基本的特征是，过去的事情又卷土重来。

一股“平调风”，从1989年开始在集体经济的水面上掀起阵阵波澜。甘肃省，轻工联社系统效益较好的74家企业，被行政部门以行业归口为由无偿划走，总资产达2800万元。太原市借行业调整为名，划走集体企业40个，平调资产3181.14万元。每年还非法收取集体企业费100多万元。据有关部门调查。江西、河北、四川、河南、贵州等省都或轻或重地刮起了平调风。

“平调风”，造成城镇集体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的大滑坡1990年全国城镇集体工业增长速度不足8%，同期增长速度乡镇企业为12.5%、私营工业为21.6%、三资工业为56%。供应商业的增长速度为3.2%。而城镇集体商业则下降了5%。自1989年以来，停产、半停产的企业主要是城镇集体企业。据有关部门统计、上半数以上集体企业面临停产半停产局面，重庆市停工待业的企业中有三分之二的企业属集体企业。

回过头去，向历史的深处眺望，我们可以看见1958年，

“一大二公”的时代，那里是“平调风”的源头。在那个疯狂的“共产”的时代里，首先是私有制经济像除草一样地被消灭了。人们觉得还不彻底，接着就开始对付集体经济，平调资产、收归国有。美其名曰：转国营。

“平调风”刮到今天，风向略有些变化。过去是纯粹的“左风”，试图把社会的所有制吹成清一色的“公”字招牌。今天的“平调风”，在“左”气中夹杂了些许私利的腥味儿。与城镇的“平调风”同时刮来的，还有乡村的“公社风”：以壮大集体经济为名，将承包到户的土地收回；借调整地块为由，大幅度地提高土地承包费；甚至用赎买的方法，把农户资产收归集体……

正如当时《农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做法，使农民群众产生了种种疑惑，是不是党的政策要变

了，又要搞过去人民公社那一套了？”

其实，受“左”的伤害最重的还是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在十余年改革的大潮中，他们充分发挥了对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补充作用。然而，那把曾经在“左”的磨石上反复磨过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刀子并没有锈蚀。

有人惊呼：在中国私营经济的土壤中，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已经萌芽了！

于是，便开始了“割尾巴”的手术：

一、发票上打入另册。许多地方，以管理方便、堵塞税收漏洞为由，在发票上专门印上了个体的拼音字头：G。一些姓“公”的单位规定，个体发票不能作为报销凭证。

二、在法律和政策规定之外，随着限制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关闭文化市场、邮票市场、果品市场、废品市场，把方便消费者的个体摊点集中在一起，如同当年毛远新“赶大集”一样。目的只有一个，限制发展。

三、在法律之外增加繁多的税、费。有的城市对个体户征收优质服务保证金。地方擅自征收的教育附加费，个体户比一般纳税者高一倍。对私营企业，除列支成本的工商管理费、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附加费、印花税之外，还征收所得税、物价调控税、个人收入调节税、治安费、暂住人口管理费、占地费、卫生费、门前三包费，凡是有权的部门都用种种名目向私营企业的口袋摸一把。有人冷冷地说：“多收费对你们有好处，不然你们就会成为新的剥削阶级，早晚要被打倒。”

四、泼脏水。这是公开的语言：贩卖伪劣假冒商品、走私货物、非法出版物，偷税漏税，吃喝嫖赌，个体经济是万恶之源。在全国个体劳动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薄一波安慰个体户说：“我可告诉大家，你们不是‘三等公民’。”“只要你们遵纪守法，按章纳税。按章经营，发展生产，搞活流通，你们就是好样的厂难怪许多个体户听了这番话，激动得热泪盈眶。

六、民心是一杆称

有人一边反对家庭联产承包制，一边又用“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20%以上的人口”做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论据。可是，如果像他们那样问一问“姓社姓资”的话，人们会发现这不是一大二公的功劳，而是包产到户的功劳。就是说，不是那个制造了普遍贫穷的纯而又纯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功劳，而是那个被割了又割的“资本主义尾巴”的功劳。

农民气愤地质问：听说现在有些“当官的攻击联产承包制，攻击农民万元户，把这都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这些人是什么心肠？他们还有脸吃我们农民提供的大米白面和鱼肉蛋菜吗？

供给制时期的商品短缺、凭票排等，今天，谁也不愿再去

做这个恶梦了。

1991年夏天，日本时事综合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山本一郎在中国作了为期两周的参观访问，回国后发表了一篇题为《没有排队现象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章，其中写道：“使我感到吃惊的事情很多，比如，潮水般的自行车把街道塞得满满的。汽车、自行车和行人并不注意交通规则，国营商店服务质量恶劣……不过，中国与以往访问过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些不同。似乎给人一种安逸感。这是为什么呢？我仔细观察后找到了答案。这就是商店没有排队现象。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但没排队现象，这是我感到最惊异的地方。”

商店没有排队现象，这在如今的中国老百姓感觉中是如此普通的现象，外国人却大感惊异。这也难怪，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多是短缺经济，凭票、排队购买商品几乎成了共有现象。于是，在西方记者笔下，排队似乎成了社会主义的一大特征。

排队现象消失，这个小小的插曲背后，蕴藏着惊人的变化：它宣告中国正在告别短缺经济。市场上商品丰富了，人们有选择商品的权利了。

人民受惠于改革，人民自然会选择改革，拥护改革，支持改革者，在许多地方，谁真心实意搞改革，群众就投他的票，谁不搞改革，就让他落选。

近几年广东领改革风气之先。广东人自己总结得很简单：“我们广东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较快，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卷入姓‘资’姓‘社’争论。”那阵子，似乎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外界对广东说三道四的不少。你引进外资，说你和平演变；搞经济特区，说你拱手把国土让给资本主义；恢复证券股市吧，又说你倡导资本剥削和投机……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弄得广东一会臭，一会香。倒是广东人自己沉得住气，埋头干自己的事。不卷入争论，就不会因争“标签”而分散发展经济的注意力；没有卷入争论，就不会因为忌这怕那而作茧自缚。广东人超脱，广东人聪明，把劲用到了点子上。结果，广东经济走到前头去了，过去不服气的也不得不佩服了；原来看不顺眼的，也转而为之羡慕，要千里迢迢去取经了。

广东人“主义”讲得少，“标签”贴得少，政治水平未见得就低。有人搞了民意调查，深圳90%的人说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使广东人过上了富裕日子，他们怎么能不拥护？

七、资本主义复辟

那是个荒诞的时期。

人们被告知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人们大唱革命歌曲，大演革命样板戏，开展革命大批判，把党内的路线斗争，国内的阶级斗争和国际上反帝反修的斗争捏合在一起，不停地运动、运动、运动着。

这到底怕什么？是什么让人们绷紧了“那根弦”，是什么让人们谨小慎微。（以至于在八、九十年代一些私营企业主花钱主要买个“集体”的红帽。）

怕资本主义复辟，怕与资本主义纠缠不休。

在六、七十年代，对资本主义警惕到草木皆兵的程度，思想是有“和字一闪念”，所以要灵魂深处暴发革命。服装里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于是除了中山装、绿军装之外，所有的服饰都被打成奇装异服；花鸟虫鱼是资本主义玩乐，统统扫进垃圾堆；香水、口红、乳罩，是资本主义的腐化，社会主义的妇女决不能使用它们；西洋乐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连乐器带声音统统扼杀；英文ABC是洋人的语言，绝不允许毒害新中国的青少年；课堂里有资本主义，于是停课闹革命，交白卷的人成了仅潮流的英雄；谁搞科研谁就是走“白专”道路；谁种自留地，谁就是留“资本主义尾巴”。自由市场上资本主义最猖獗，所以毛远新让农民像士兵列队一样赶社会主义大集……。

资本主义成为一个罪恶的概念。一个清晰却又模糊的敌人。凡是不顺眼、不习惯的东西都是资本主义——到了80年代，开始是指责轻音乐，后来又诅咒通俗歌曲、迪斯科和霹雳舞，谴责现代流派的绘画、摄影和文学创作。有人看不惯演员手持麦克风演唱，便指责这是“崇洋媚外”。

在这几十年来，口口声声“不断革命”、“反修防修”的“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一直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揪文艺黑线、教育黑线、哲学黑线、经济黑线，无休止地在党的内部寻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砸烂了“毒草丛生、群魔乱舞”的文坛，史学上打倒了翦伯赞，哲学上打倒了杨献珍。经济学打倒了孙冶方，党内打倒了刘少奇……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一种败家的行为：对“白专道路”的批判在毁灭人才的同时也毁灭了科学。对“物质刺激”的批判帮助懒惰击垮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最终得到了什么？

愚昧和贫困。

正是在人们忙于政治运动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中许多国家，却是另一番景象：战败的日本崛起于东方，随之而起的又有亚州“四小龙”的腾飞；在欧洲与西德复兴的同时，西欧和北欧的国家，也以很快的速度，发展了经济，他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以万美元为计算单位。

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事实摆在面前，资本主义并没有死亡，新技术革命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工业革命初期的激化弊端、罪恶、危机已经不复存在了。

由于经济的落后，“社会主义必然要战胜资本主义”的理论，也就显得苍白而没有说服力了。

靠抵触、排斥、口号打倒，一种制度试图战胜另一种制度，是不可能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马克

思)。

八、鬼子来了

有一首为开放而“痛心”的谣言：“革命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意有所指——“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又回来了。”

“皮包”里装的什么？

洋货、洋钞、洋技术……

深圳特区创建六初，有这么一个小插曲，有人去那儿看了之后，一屁股坐在地上捶胸洒泪：“我们几十年流血牺牲赶走的‘鬼子’又回来了。”

“铁桶政策”使人们长期在封闭的环境里生活，对外界变化一无所知，突然间又见“洋人”来赚中国人的钱，真是触目惊心。

也许正因为如此，沿海特区一直处于是非争论的漩涡之中。

一位台湾学者曾尖锐的指出：美国船队敲开锁国 200 年的日本人们，日本并不认为是耻辱，反而庆幸由于这个刺激，使日本惊醒。中国则不然，象一个赤身露体而衰老患病的梦游者，被鸦片战争惊醒后，发现了自己所处的窘境，而认为惊醒他的人罪该万死。

近代日本的崛起，得益于三次开放国门。——

第一次开放国门：100 年前，日本在“黑船”进逼之下，被迫放弃锁国政策，提倡“洋才和魂，脱亚入欧”，成为远列强之一。并在“海战”中击败了清王朝。

第二次开放国门：二次大战中战败的日本，引进欧美技术，以贸易立国。日本人不无骄傲地称：凡是有市场，就有日本商品；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日本观光客；凡是当年“皇军”用大炮无法达到的目的，如今的商社无一不能达到。

日本在 80 年代第三次开放国门。批判日本人的“岛国根性，加快了资本输出，以致有人惊呼”日本差点买走联合国大厦了。”

若以条件而论，日本远远不如中国。中国人称之为“小日本”、“弹丸之国”。但日本开国在先，得益在先，发展在先，而今不是以洋枪较力，而是以经济、技术较胜。

所以我们只能叹其神奇，自叹落后。

人们记得八十年代中期，由于某种缘故，在中国一些大城市中发出过“抵制日货”的声浪，但事实是至今‘日本装’仍是时髦标志，大街上是“皇冠”“本因”商店里是松下、日立，影屋里是比国产胶卷贵一倍即仍受青睐的“富士”……

面对“日货”，以及“日元贷款”，以民族主义的“不”字，永非一劳永逸。尤其是在世界一体，开放贸易壁垒的当代，唯一的就是要生产出比“日货”更强、更有竞争力的“国

货”品牌，甚至以坚强的“人民币贷款”抵制“日元贷款”。

只有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引进技术。

曾经由“松下”、“日立”独霸大半市场的中国，“长虹”以引资技术生产的彩电，已坐稳了“龙头老大”的地位。

中国落后的轿车业，也有了标致、桑塔纳、奥拓等合资品牌。

外商独资经营的“摩托罗拉”、“上海日尔”，则是以先进技术的引进，大大缩短了我国同世界水平的差距。

同样，在洋人的经销策略、财大气粗的背景下，民族产业也举步维艰：“可乐”以“可口”称雄，国内厂家甘拜下风，一些分百姓相伴几十年的日用品牌也烟消云散了或被一口吞并。

美国花旗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日本三和银行、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东方汇理银行等一批外资银行也在上海和浦东建立分行。

1979年4月，特区创办之初，邓小平曾说“杀出一条血路来”，经历过多少非难和争论。至今人们多半不会以“鬼子来了”来看待外资、看待洋货了。

中国近10几年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也得着于开放的政策。到1993年已成功引进外资800亿美元，有“三资企业”4万多家，填补了国内投资严重不足的窟窿。

看看周边国家，从东盟五国，到巴基斯坦、印度和独联体各国，都在敞开门户，千方百计吸引海外投资，且势头看好。

机遇转瞬即逝，时不待我。

中华民族只有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只有使世界市场接受中国的产品，中国才能拥有自己的世界。最可怕的不是世界孤立中国，而是中国自己孤立自己。

九、“左”比右好

“左”比右好，虽然历史没有“窝里斗”那么悠久，却繁衍发展的异乎迅猛。

革命史上的三次“左”倾几乎断送了革命前程，危害不可谓不烈。然而延安整风中却又开了反“左”时用“左”的手段的先河。建国以后，特别是1957年反右以后，“左比右好”就到了蓬勃发展的阶段，“反右以后别发言”，成了许多国民防身之宝。非发言不可，也必是越左越好，谁还想再戴右派帽子被“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蹄子”？

更重要的是，一批反右受惠的好汉更是悟出了个中三味，持左反右即可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加上一个又一个运动更为这雨后的毒蘑提供了滋生的沃土，一发而不可遏止。以至于像以反左为初恋的庐山会议竟魔术般地变成反右为主调。

“左是认识问题，动机是好的，是要革命的；右是立场问题，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的。”最大的傻瓜也不愿打入反革命

堆里。

“左”是“革命”过头，讲“马列”过头，但终归是“革命”，讲“马列”，心是好的，动机是善良的，最多不过是“内部矛盾。而右就不一样了，治了右的边，就可能被扣上“反动”、“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帽子，就是敌我矛盾，要你永世不得翻身。

反“左”与反“右”，劲头也大不一样。一说反右，就雷厉风行，赤臂上阵，步步升温，层层加码，整得越狠就越痛快，越革命，恨不得来个“肉体消灭”。

要反“左”，就多是说说而已，人家只是“革命”多了一点，够得上什么“杠杠”？你能把他怎样？

右一次永世不得翻身，左十次时过境迁依然升官发财。读一读十年“文革”历史，有哪一个治“左”者不运交华盖写下辛酸的血泪史？又有哪一个反“右”英雄不曾踏着“右”的躯体上升？也难怪人们宁左勿右，也难怪“左比右好”倍受青睐。

在这种政治氛围中，聪明的更提炼出绝妙的政治斗争艺术，动不动给看不顺眼的人扣上“右”的帽子，以排除异己。彭德怀庐山上书，本是忠诚肺腑之言，一夜之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从此不得翻身。

以“左”反右，这是奸人整好人最凑效的办法。比如，某人搞腐败，这只是个人时问题，无碍大局。但谁要去说，谁要公开去揭露，没准对方倒打一耙：你揭露社会主义阴暗面，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一下弄成个“政治问题”，结果是骂腐败的比干腐败的还倒霉。

倒是反右，每一次都轰轰烈烈，一反就反出万马齐喑，草木皆兵的局面。以至在“文革”中出现了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红色恐怖”。直到现在，聪明的人仍忌谈国事，噤若寒蝉。正如有人所言：“不问国事最保险，埋头挖墙角最实惠。”

街头巷尾，常有人议论这样的现象，有的人口头上高喊反对崇洋媚外，说起西方就咬牙切齿，却在暗地里最先把自己“洋化”——坐洋车、用洋货、服洋药、住洋楼、存洋款、看洋“三级片”……争先恐后把子女弄出洋，还蔑视辛勤操劳的同胞“马列修养太差”。他们是真正的国家蠢虫，民族的败类。

“根深蒂固的是‘左’的东西”（《南巡讲话》）

“‘左’的根子很深。”（《邓小平文选》第334页）

“‘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同上书第28页）

“中国要警惕右，还主要是防止‘左’”（《南巡讲话》）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进行那场拨乱反正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与“左”的思潮进行了三次大的“交锋”，但“左”并没有偃旗息鼓。改革开放的道路一有点什么波折，马上卷土重来，登台表演。

“左”的思潮，“左”的势力，左家庄的棍子专业户，如果不认真消除，改革开放的阻力将会源源不断。